



首都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LIANGQICHAO HE ZHONGGUO XIANDAI
WENHUA SICHAO

梁启超和 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易鑫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首都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易鑫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易鑫鼎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19-829-4

I. ①梁… II. ①易… III. ①梁启超 (1873~1929) — 思想评论 IV. ①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597 号

LIANGQICHAO HE ZHONGGUO XIANDAI WENHUA SICHAO

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易鑫鼎 著

责任编辑 王启明 张宏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 240mm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42 千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绪 言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博学多识，论著宏富（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计有 1400 多万字，未刊稿在外），思想和经历也很复杂。一些“评传”或专论只就其在“政潮”中的经历进行评述，给其定位是“改良派”或“保皇派”，对他的个性思想特点却较少深入的分析。一名之立，就让人“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厌”。这种状况，是由多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有些论著对“改良派”“保皇派”外衣下的梁启超若有一些新发现，意图揭去其外衣，还他一个本来面貌，这种趋势是可喜的。但也仅仅是“趋势”，和梁启超的思想原貌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

梁启超爱谈“思潮”“政潮”“潮流”。他曾经是“舆论界执牛耳”的“巨子”，凭藉所掌握的报刊，“兴风作浪”地倡导过一些“思潮”，耸动了一时视听，有的成了国人的“共识”，有的却被对立面消解了。历史潮流，真像“大浪淘沙”，淘去了许多思想主张和文字，也淘去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弄潮儿”。

近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真像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刚去一波来”，潮起潮落，兴起得快，流转得也快。但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社会思潮究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江河的浪潮，某种文化思潮虽然过去了，但它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像长江入海口淤积而成的崇明岛，原先只是一个小淤积，现在居然成了一个人群聚居的偌大的崇明县；它也像树木成长中的年轮，永远记载着它成长的经历。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所显示的诸多优点和缺点，总是和前代思潮有或明或暗的关系。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文明无不堪旧迹而演来，亦已矫往事而生偏至”（《文化偏至论》）。这就是说，清理历史思潮的“淤积”或

“年轮”，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在近百年文化思潮的淤积中，梁启超的诸多论述，就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我在编了《梁启超选集》之后，脑子里常有许多杂乱的想法在翻腾，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后来有朋友说，这么一堆文章有什么意义呢？你为什么要选它呢？你能不能加些按语，给读者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呢？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这也是梁启超长期被冷淡造成的。我用心地想了想，能不能把那些杂乱的想法整理一下？能不能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让人们直接了解梁启超呢？也就是在这种想法指引下，我慢慢地形成了要概括“梁启超和现代文化思潮面貌”的题目，具体做法，就是拟出一些子目，让梁启超分别“出场说法”，直接引证他的论述，稍加评点，不作长篇大论的批评。他的是非功过、斜正曲直，让读者去评断好了。这种想法，也就决定了本书的面貌和特点。经过一年多的摸索，这才形成了《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书稿。笔者自感满意的是，全书是按“如实知见”的态度来反映梁启超的思想和经历的，没有故意隐恶扬善，也没有故意扭曲拔高，只是对他的思想作一些浅近的揭示，为人们认识近百年历史提供一种借鉴。诚然，笔者眼界有限，识断不精，荒疏之处，所在皆有，还请海内行家不吝赐教。

2007年8月3日于北京西郊花园村

目 录

绪言	(1)
----------	-----

上编 梁启超思想漫论

第一章 梁启超的文化性格	(3)
一、文化性格略论	(3)
二、梁启超的文化性格特点	(5)
(一) “学而不厌”地追求新思潮	(6)
(二) 梁启超的应变观	(8)
(三) 梁启超关爱后学不护短	(10)
(四) 梁启超的英雄观	(12)
(五) 梁启超的宗教观	(16)
(六) 梁启超的成败观	(21)
(七) 梁启超的生死观	(31)
第二章 康、梁师徒俩的矛盾关系	(35)
一、学海堂的高才，十七岁的举人	(36)
二、梁举人居然拜康秀才为师了	(38)
三、万木草堂讲学的创新意义	(40)
四、康、梁学术上的分歧	(43)
五、保皇派内部的革命倾向	(46)
六、在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中	(53)
七、寿文和祭文	(69)

第三章 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矛盾关系	(73)
一、“如实知见”画出历史运动整体印象	(73)
(一)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	(76)
(二) 孙中山驳“瓜分说”“幼稚说”“蠲等说”	(77)
(三) 孙中山论中国“不会被瓜分”“地价法问题”“五权分立”宪法等问题	(78)
(四) 胡汉民论“民报”六大主义	(80)
(五) 陈天华论不学“日本君主立宪”	(80)
(六) 朱执信论“满洲不能立宪”	(81)
二、梁启超驳议之一——《开明专制论》	(82)
三、梁启超驳议之二——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	(91)
第四章 梁启超和袁世凯的矛盾关系	(97)
一、归国和设想	(97)
二、在“政党政治”潮流中浮沉	(107)
三、“倒袁”斗争的前后	(122)
第五章 “依据西学，批判中学”思维逻辑的历史功过	(143)
一、首倡者——严复	(143)
二、梁启超的推广运用和发挥	(150)
三、“依据西学，批判中学”思维逻辑的历史功过	(162)
第六章 梁启超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徘徊	(169)
一、“政才”“艺才”与振兴国家民族的关系	(169)
二、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及中国学术的弊病	(172)
三、梁启超“欧游”和回归中国文化	(180)
第七章 梁启超的民主主义思想	(192)
一、“西学”滋长了梁启超的民主主义思想	(192)
二、民主主义的历史观	(195)
三、民主主义的社会批评	(203)

第八章 梁启超对中国民族性的探讨	(210)
一、地域和中国民族性的关系	(210)
二、中国民族性在民族融合中显示出优点和不足	(214)
第九章 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223)
一、从时事变幻中揭露中国国民性弱点	(223)
二、从专制制度、内乱等方面揭露中国国民性弱点	(232)
三、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国民性优点	(240)
第十章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关爱后学	(247)
一、梁启超教育思想的几个要点	(247)
(一) 为学首在立志	(247)
(二) 教育的宗旨和道德标准	(247)
(三) “官学”体制和学问的矛盾	(249)
(四) “美式教育”和“精神饥荒”	(252)
(五) “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	(254)
二、热心办教育 关爱后学	(256)
第十一章 梁启超学术研究的内容和特点	(274)
一、更新研究方法 获取新的认识	(275)
二、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综合性研究	(285)
(一) 从源头上揭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弊病 ...	(286)
(二) 对上古至秦统一中国历史变迁作了综合考察	(288)
(三) 《儒家哲学》对儒家思想演变的总结分析	(297)
三、《儒家哲学》给我们的启发	(329)
(一) 儒家思想有哪些可取的成分?	(329)
(二) 孔子、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的主要贡献	(330)
(三) 秦汉以后儒学演变的模式	(338)
四、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综合研究	(339)

LIANGQICHAO HE ZHONGGUO XIANDAI WENHUA SICHAO

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

思

潮

五、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综合研究	(349)
六、解开中国古代思想被扭曲的“扣”	(351)
(一) 二十世纪以来“解扣”的意向	(351)
(二) 几位大师的“尧舜禅让”说和驳议	(354)
(三) 顾颉刚“解扣”的理论主张	(364)
(四) “禅让”说是怎么产生的?	(365)
(五) “禅让”说和中国文化思想	(370)
第十二章 梁启超和“诗界革命”	(379)
一、“诗界革命”的实践和理论主张	(379)
二、对《尝试集》和白话诗的评论	(382)
第十三章 梁启超和“小说革命”	(387)
一、“小说革命”的背景	(387)
二、梁启超的“小说革命”主张	(390)
三、梁启超的社会批评和晚清小说的关系	(398)
第十四章 梁启超的散文	(402)
一、梁启超的散文主张	(402)
二、梁启超散文发展状况	(405)
(一)《变法通议》前后的散文	(405)
(二)《自由书》及其他散文	(409)
(三)《新民说》及其他散文	(416)
(四)“倒袁”文章和《欧游心影录》	(425)

下编 梁启超对后继者的影响

第十五章 五四文化革命和梁启超	(433)
一、梁启超倡导的文化革新和五四文学革命联系紧密	(434)
二、关于文学形式的革新	(436)
三、关于文学内容的更新	(437)

第十六章 胡适和梁启超	(445)
一、少年胡适崇拜梁启超和后来的学术道路	(445)
二、胡适投师后，梁、胡的交谊	(448)
第十七章 鲁迅和梁启超	(459)
一、对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现状的分析	(459)
二、关于“破坏主义”	(460)
三、关于外来“新名词”被曲解和利用的问题	(461)
四、关于“希望”和“失望”	(463)
五、如何看清现实人生的“真实”问题	(465)
六、关于“通悟”和导致偏狭见解	(465)
七、《药》里夏瑜的话的含义	(467)
八、关于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缺点的探讨及《阿 Q 正传》	(468)
九、鲁迅“批孔反儒”略论	(473)
第十八章 毛泽东和梁启超	(477)
一、少年毛泽东崇拜梁启超	(477)
二、毛泽东著作掩映了梁启超影响的痕迹	(480)
三、毛泽东诗词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佳作	(484)
后记	(491)

上 编

梁启超思想漫论

第一章 梁启超的文化性格

一、文化性格略论

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晶。特别是语言、文字的繁衍发展，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同的民族文化，铸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国民性格。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同一民族文化中，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性格。这种性格通常是以思想家、智者的主张或某种约定俗成的见解为代表。同样的道理，随着民族的发展变化，同一民族中的文化性格也在不断地衍变，有时是偏于一极（如反对外来侵略，如反对专制腐败），有时则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性格互相促进或融合，形成新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性格或倾向。这说明我们在研究历史文化或名家思想时，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而是要从历史潮流的变化中来讨论问题，尤其不宜把某种思想、见解孤立化、绝对化，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但符合历史事实，它还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实，不妨举例略作说明。

比如，孔、墨、老三大大家，所处时代大体相同，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很不相同。孔子主张“仁”，“仁”的要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在墨子看来，孔子所说的“爱”是有亲疏厚薄之分的“等差”之“爱”，也就是在“等差”之外是“爱”所不及的。墨子因此提出了“兼爱”，他在《兼爱上》中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他

是把“爱”的范围和程度，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孔、墨在“劝爱”问题上虽有分歧，但还有共同之点。老子就不这么看问题，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这是对孔、墨所主张的那一套表示了极大的否定。庄子以寓言的方式说得更浅近入理：“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他还说，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善待”，他们仿照人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为浑沌“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这和伯乐治马却把许多好马治死了是一样的（见《马蹄》）。这是说，按照某种主观设定的标准去规范或改变“天物”，后果多是不好的。这两种文化性格或见解，几乎势同水火，不可调和。

经过汉初崇尚黄老，与民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实行开疆拓土，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统一社会思想，儒学被立为“官学”，其他各家被压抑或削弱了，社会起了变化。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深化了，对儒、墨、道三家思想的认识也深化了。经过汉末残酷的动乱，人生无常的感受很普遍，于是崇尚老庄清谈，魏晋时期的何晏、王弼就“以道释儒”。王弼的《周易略例》很受称道，如“颐初九注”曰，“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周易》本是儒家经典，王弼却依据道家思想阐述《周易》的义理。从历史发展看问题，弼注显然总结了两汉以来众多功臣名将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它受称道的原因。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弼注之所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这说明弼注还纠正了汉代以来《周易》研究的偏向。——这样的例证甚多，它说明民族文化是随着历史潮流发展变化的，它促进了各种文化性格的融合和交流，从而滋生了新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总是依据时代潮流的需要，吸取历史遗产中的某些成分，然后提出新的命题或论断。像

孔、墨、老一样，他们是各自独立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不宜用某家取代或否定别家。文化性格的内涵是可以根据历史背景加以论证的，但它的外延性很广。这就是文化性格既要承前，又能启后的原因。

“独尊儒术”的政略，开了儒学和俸禄挂钩最坏的先例，其后为争立博士官引起的激烈争论，由此派生的“门户”“宗派”之见，“家法”之界，反对“背师说”等等恶习，都是在维护学术名义下的利禄之争，影响极为深远，既阻碍了儒学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家学说的发展。顾炎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一再批评“官学”不利于学术发展，就是这个原因。“独尊儒术”的政略在总体上阻碍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在《沁园春》词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个批评很中肯。秦汉之间及汉武帝时期，除司马迁“发愤”撰成“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以外，其他文化学术的创新发展确实少见。较之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秦汉以后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独尊儒术”政略影响造成的。

二、梁启超的文化性格特点

梁启超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开创什么新事业的大人物，他的文化性格也有讨论的价值么？回答是肯定的，很有讨论的价值。

梁启超的人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走在最前列的人生，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等诸多风雨的人生；他的中国文化根基很深厚，对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也很了解，加之他长年生活在国外，游览过欧、美、澳、日本、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广泛涉猎了西方文化学术，对西方世界的民情风俗有很切实的了解；可以说，他是现代文化史上少有的贯通中西文化的博学之士。他又是个“报人”，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问题多有思考，发表过许多文章，表达了他

LIANGQICHAO HE ZHONGGUO XIANDAI WENHUA SICHAO

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梁

的爱国热情和振兴民族国家的愿望。他的丰富经历，促成了他的文化性格具有多面性的特点。

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人们对梁启超缺乏了解。一提起他，有论者就情不自禁地嘲笑说，“哦，梁启超的名言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太不可信了！也太可笑了！”其实，这种“可笑”的看法就是一种误解。梁启超的“名言”，并非信口开河，《大学》上“日日新，又日新”两句话，就是它的根据，他对此还有一些新的解说（见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善变”确实是梁启超文化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追求新思潮、新学术上，梁的“善变”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他在“政潮”中“善变”，就是一个很讨厌的毛病。

中国近现代史的多变性，也就决定了这期间许多文化性格的多面性。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严复、杨度、陈独秀、章士钊等人的思想经历，就会发现他们的文化性格是经历了多次变化的。梁启超经历了其中几次历史巨变的全过程，他的文化性格也就显示出多面性的特点。但是，他和上述诸人不同，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似乎还没有走到“终点”，还在不断地追求。

为了便于讨论，下边分成若干问题作些分析。

（一）“学而不厌”地追求新思潮

不断地追求新思潮，是梁启超文化性格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1920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第26节中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启超则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

女儿令娴《艺衡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这是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总结自己一生追求新思潮、新学术的自我评价，他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后后期了，时年48岁。从这则论述里，可知梁启超的博学是广泛求索获得的；他的“多变”也和这种求新、求上进的性格大有关系。

梁启超追求新思潮、新学术，有些举动是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他原是广州学海堂的高才生，对朴学很有兴趣且有成绩，17岁中了举人，一片锦绣前程已在前面展开。只因听了康有为抨击朴学的讲演，就决定离开学海堂，投师于康秀才门下。这是常人所不敢设想的。因为求新、求上进的超常变动，使他成了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

他承认“一生学问”得力于康门，但受严复启发后，发觉康有为“保国、保教、保种”的主张不妥，就毫不犹豫地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提出驳议，“区区小子，昔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这个“背师说”使康很尴尬，梁启超却坦然说，“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他显然受了西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启发，所以对这个反传统的行为很自信。这是他更新学风一个值得赞赏的举动。

从主编《新民丛报》起，他“依据西学，批判中学”，倡导史学革命、道德更新、小说革命、诗歌革命、文体革命，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但他并不自信、满足。1918年“欧游”，事实上是“访学”，他广泛接触了英、法、德诸国的文化界和知名学者，得知西方学者意图从东方文化中获得借鉴，以改变西方社会思潮（见《欧游心影录》）。他回国后就投入了学术研究，拟定了庞大的研究计划，撰写了许多有创见的论著。他是要借此机会，更新中国文化研究，并为西方学界提供借鉴。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论著受到外界称道，就是好例证。